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

《文心雕龙》研究

WenxinDiaolong
Yanjiu

赵耀锋 ○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

《文心雕龙》研究

WenxinDiaolong
Yanjiu

赵耀锋〇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研究 / 赵耀锋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525-0677-8

I. ①文… II. ①赵… III. ①《文心雕龙》—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133 号

《文心雕龙》研究

赵耀锋 著

责任编辑 王佐红

封面设计 陈冰融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0762

开 本	720mm × 98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677-8 / I·31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学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科学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提升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之际,宁夏师范学院“学人文库”终于破壳问世了。

为了呈现三十多年来一批学科中坚的代表性成果,推进学术繁荣,让宁夏师范学院这所年轻的本科院校师生的学术结晶有展示的平台,“学人文库”的编辑出版,必将是一件福荫后学的事业。

“学人文库”第一辑的著作、作品与宁夏师范学院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还是一个“新生儿”,但是有了这个开始,她会在阳光、风雨中成长、进步。我们相信,有前辈学者的筚路蓝缕,又有“后学”的薪火相传,诸多的学术积累定然会在漫长岁月中留下回响。值此之始,我们期望更多的学人以此为契机,潜心研究,锐意创造,积学、向学,奉献出更多更好的智慧成果。

“清水河畔静读书,六盘山下育英才”。宁夏师范学院得清水河之娟秀,六盘山之伟豪,虽然僻远贫闭,但有了宁夏师范学院一批批“学人”智慧的烛照,固原——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必将焕发新的文化内涵。

“学人文库”本着开放的视野,以系列丛书的形式融汇宁夏师范学院学人研究成果中的华彩乐章。无论以时间为序,还是按学科分类,或者依专业建类,我们需要呈现的就是术业有专攻的各类文风,彰显“宁师学苑”的片片风景。

“学人文库”编委会

《〈文心雕龙〉研究》摘要

本文共分五部分:绪论、作家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小书以文艺学和文献学打通及以史证诗的研究方法,在具体写作中以文献考证和文本细读法相结合,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中古史籍中文苑传、文学家传记的相关考证,在全面探讨《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产生的文学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其文学理论的形成及其诗学意义,认为刘勰文学思想是对中古文学理论的系统总结。

绪论部分论述了《文心雕龙》产生的文学、文化背景。该部分着重就佛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钩沉,对佛学对《文心雕龙》理论范畴、全书的体系结构、诗学思维方式诸方面的影响都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章还探讨了《文心雕龙》在中古文论史上的历史地位,认为《文心雕龙》的产生标志着中古文学制度的自觉。

第一章着重论述了刘勰的文学观及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刘勰的文学观体现在其文学史观、宗经文学观、政教文学观、中和文学观、通变文学观、“折衷”文学观等方面,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能够将刘勰的文学思想置于中古文学的大背景之下,从当时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形出发分析刘勰文学思想产生的根源。本章还探讨了刘勰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文心雕龙》实际上包含着对政治与文学之关系、文学与学术之关系、中古文学风气、地域文学、家族文学、音乐与文学之关系等方面的系统研究,在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上属于“广谱研究”,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章为作家论,主要论述了刘勰对于作家品德修养、心性修养、才

学修养方面的理论,认为刘勰在继承前人对于文士修养的要求的基础上,对文士修养从德行、才学、心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刘勰的这些思想对古典文艺心理学、美学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为文体论,刘勰受中古时期经书注解及佛典翻译中义疏体之影响,运用考镜源流、辨彰学术的传统学术方法,注重从词源学的角度,以声训、义训、形训的方法解释各种文体命名之本义,阐明各种文体写作规范,确立每种文体的经典之作作为文体创作效法之对象,全书体现着一种强烈的辨体意识,而且对文体的分类更趋细化,标志着中古时期文体论的自觉。

第四章为创作论,以文艺心理学为切入点,以《文心雕龙》文章学思想为关照对象,对刘勰的文章学思想进行系统阐释,论述深入细致而不流于琐屑。

第五章为批评论,在深入分析《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思想形成的文化背景、理论渊源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批评论所蕴含的诗学思想、批评方法的理论价值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其设喻法、溯源法、比较法、摘句法、引证法等批评方法所蕴含的重要学术价值及其对后世的重要影响,着重从诗学理论和方法论价值两个方面对《文心雕龙》的批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



目 录

绪 论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产生 / 1

第二节 《文心雕龙》与六朝文学制度的自觉 / 29

第一章 刘勰的文学观及文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刘勰的文学观 / 44

第二节 刘勰的文学研究方法 / 65

第二章 作家论

第一节 作家品德修养论 / 85

第二节 作家心性修养论 / 91

第三节 作家才学修养论 / 96

第三章 文体论

第一节 文体论的形成 / 100

第二节 文体研究的范式 / 104

第三节 文体论的价值 / 108

第四章 创作论

第一节 艺术构思论 / 119

第二节 创作技巧论 / 134

第三节 作品优劣论 / 157

第五章 批评论

第一节 批评论的形成 / 171

第二节 批评理论 / 175

第三节 批评方法 / 179

余 论 / 209

参考文献 / 211

后 记 / 219

绪 论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产生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的巅峰之作,在其产生的当代,就引起了文坛领袖沈约的高度重视,《梁书·刘勰传》称:“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①除沈约之外,大概是由于“阳春白雪,和者盖寡”之故,《文心雕龙》在当时没有引起广泛重视。现存敦煌遗书中唐写本《文心雕龙》残卷的发现,说明《文心雕龙》在唐代已经引起了重视。历唐至宋,《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被重新发现,宋代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曰:“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②宋代黄庭坚在《山谷尺牋与王立之》中曰:“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曾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③清代章学诚在论及唐前文学理论著作时曰:“《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④今人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也很高,鲁迅先生在《诗论题记》一文中说《文心雕龙》“篇章既富,评鹭自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释神质,包举洪

①(唐)姚思廉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②③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45页。

④(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9页。

纤,开源导流,为世楷式”。^①杨明照说《文心雕龙》“是刘勰惨淡经营的巨大成果,也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巍然屹立的高峰”^②,曹顺庆认为《诗学》《文心雕龙》和印度的《舞论》,鼎足而立,为世界三大文论支柱。^③以上各家,都堪称刘勰的隔世知音,他们对《文心雕龙》之极力推崇,正说明了《文心雕龙》具有卓越的文学理论价值。这样一部对后世学术有着深远影响的文章著作,其产生不是一个偶然的文学现象,而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

政治方面,在前科举时代,门阀制度对文学创作的激励,不亚于科举制度的功利主义刺激。哲学方面,佛学的输入,使得吾国国民的逻辑思辨能力进一步提高,思维的深度、广度都得到进一步的延展。而且,佛学对前生、来生概念的引入,催发了士人对生命价值的重新认识。中古士人并不相信佛教所谓来生之说,但是他们开始考虑有限生命的意义及生命意义的延续,“立言”开始被置于人生价值观的首位,士人传统的价值观体系被重置,文学的潜在意义受到空前重视。玄学清谈使得士族使用语言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而且清谈中涉及到了言意关系、有无关系、形神关系这些哲学命题,这些命题都与文学理论相关。美学方面,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④又曰:“晋人对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情,对外发现了自然美。”^⑤一方面,南方秀美的景色促进了山水审美的自觉;另一方面,六朝人物品评由对士人的道德评价发展为审美评价。六朝士人对自然的外审美和对自身的内审美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这些理论,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之中,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学术方面,章学诚认为:“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

①鲁迅:《鲁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页。

②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③曹顺庆:《从总体文学的角度来认识〈文心雕龙〉的民族特色及其理论价值》,见户田浩晓等著,曹顺庆编:《文心同雕集》,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143页。

④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页。

⑤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此为一变。”^①中古时代是一个新旧学术交融变动的时代。日本学者川勝义雄先生认为“六朝中后期(齐梁)是六朝南方贵族文化的顶峰”^②,当时的文化主要体现为文学。此期文学走向自觉,随着文学的自觉,文学创作中一系列理论问题都引起了文士们的注意,当时对这些文学理论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客观上需要对这些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文心雕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 哲学背景

在哲学领域,六朝是一个异常活跃的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在此期都曾风靡一时,这是一个多元思想并存的时代。《颜氏家训·勉学》篇曰:“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顽鲁,亦所不好云。”^③可见道家经典《庄子》《老子》、儒家经典《周易》同时受到了当时士人的重视。《世说新语》载:“支道林造即色论,论成,示王中郎,中郎都无言。支曰:‘默而识之乎?’王曰:‘既无文殊,谁能见赏?’”^④“默而识之”出自儒家经典《论语》,说明僧人支道林儒释兼修。又载:“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隼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⑤这条记载说明支道林在精通儒释之外,还对道家经典《庄子》中的名篇《逍遥游》有着精深的研究,否则不会对《逍遥游》“作数千言”,而且“才藻新奇,花烂映发”,可见,支道林儒释道兼修,中古时期高僧和文士在学养方面儒释道兼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风气。

①(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7页。

②川勝义雄:《魏晋南北朝》,东京:讲谈社学术文库2003年版,第263-269页。

③(北齐)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

④⑤(宋)刘义庆撰,徐震堉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21页。

儒释道三家思想兼修,这是六朝时期士子修养的普遍情况,罗宗强先生在论及这一点时曰:“自从东晋后期佛学影响迅速扩展之后,玄佛实际上已经合流。在玄佛合流的同时,儒家思想也恢复了它的影响。在思想领域里,又出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①这种多元思想并存的局面,对文人思想性格的影响是深刻的,每一家的思想可能在其时的文人身上都留有痕迹。鲁迅在论及此期文人的文化修养时曰:“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②这非常形象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文人思想性格的构成情况。处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刘勰的思想也是儒释道三家兼综,《灭惑论》曰:“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又曰:“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③刘勰认为儒释道三家有相通之处,《文心雕龙》就体现出了儒释道三家思想杂糅兼综的倾向。具体说来,在论述文学之功用及文学创作的外部规律时,主要体现的是儒家的思想,文之枢纽部分“宗经”、“征圣”便是儒家思想的具体表现。在论述文学艺术的内部规律时,主要体现的是道家思想,如“自然”、“虚静”等文学观念便是道家思想的表现,罗宗强先生说:“在创作论中他引用《庄子》15次,涉及《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德充符》《骈拇》《天道》《秋水》《知北游》《徐无鬼》《外物》《天下》诸篇。有的是引用其术语,有的是直接用其文句,有的虽引其文句而改变其用法,有的则是引其思想而以己之言语表达。”^④严寿澂先生在《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一文中就认为刘勰论文中的“道”就主要是受了道家思想影响的结果。^⑤可见道家思想对《文心雕龙》有着极深刻之影响。而《文心雕龙》一书的书名、理论框架、论文方法则主要受了佛学思想的影响。在具体论述的过程中,三家思想的影响也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均有影响。对于儒家、道家思

①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5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55页。

③ (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09页。

④ 罗宗强:《〈文心雕龙〉的成书和刘勰的知识积累——读文心雕龙续记》,《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4期。

⑤ 严寿澂:《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想的影响,前人论之已多,本文不再展开论述,唯有佛学的影响,前人尚有未发之履,有进一步论述之必要。

关于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过去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①,虽然这种说法过分夸大了佛学在刘勰思想中的地位,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佛学的确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产生过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体例结构、思想内容、论文概念等方面,下面从这几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②

刘勰生活在南朝佛教的鼎盛时期,当时的著名文人大都具有很高的佛学修养。《高僧传·慧远传》称:“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③《高僧传·慧睿传》曰:“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谘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④谢灵运对佛学的精深造诣,在当时文人中很有代表性。又《宋书·谢灵运传》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文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此言。”^⑤从孟顗对谢灵运对自己佛学修养评价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古时期,佛学修养高低是评价士人才能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这种佛学盛行的时代风气下,刘勰的一生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梁书·刘勰传》开篇云:“勰早孤,立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叙之。今定林寺所藏经,勰所定也。”^⑥同传终篇云:“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惠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公毕,遂企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惠地。未期而卒。”^⑦他一生的黄金时期是在佛寺度过的,与当时的名僧僧祐一起生活了十多年,作了大量的佛经译注及整理工作,据历

①马宏山:《论〈文心雕龙〉的纲》,《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

②此节中的部分内容原刊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题目为《论佛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有改动。

③(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1页。

④(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60页。

⑤(梁)沈约撰:《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5页。

⑥(唐)姚思廉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0页。

⑦(唐)姚思廉等撰:《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712页。

代学者考订,现传僧祐的著作,大都出自刘勰之手。明曹学佺《文心雕龙序》曰:“传称刘勰深于佛理,京师寺塔,名僧碑志,多其所作,予读《高僧传》往往及之。……窃恐祐《高僧传》乃勰手笔耳。”^①明徐渤《文心雕龙跋》曰:“今观其(僧祐)《法集总目录序》《释迦谱序》《世界记序》等篇,全类勰作。”^②于此可见刘勰有极高之佛学修养,这种修养对《文心雕龙》一书当有极深远之影响。范文澜先生说:“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③杨明照先生说:“《文心》全书,虽不关佛理,然其文理密察,似又与之有关。”^④黄广华先生在《〈文心雕龙〉与因明学》一文中认为《文心雕龙》受了佛教因明学的影响。^⑤张弘先生也认为佛学对《文心雕龙》有深刻影响,曰:“认为《文心雕龙》受到佛教不同程度影响的有中国大陆的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马宏山、张少康、汪春泓、陶礼天等,港台有饶宗颐、张意文、石垒,日本有加地哲定、兴膳宏等。我个人也属此列,且持论更加坚定。我曾两度撰文认为,《文心雕龙》的成书及全书的结构是受到了佛教《成实论》的深刻影响;刘勰和《文心雕龙》有深邃的佛教神学思想。”^⑥张弘先生还撰写了《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佛教神学思想》等论文对佛学对刘勰文学思想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分析以上各家的观点可知,佛学思想对《文心雕龙》一书有着极深远之影响。

(1)《文心雕龙》的书名滥觞于佛学

《文心雕龙·序志》篇在解释《文心雕龙》的书名时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也。”刘勰把他的论文名著名曰文心,并认为“心哉美矣”,这种思想来自佛学。刘勰的《灭惑

①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63页。

②黄叔琳注,李祥补注,杨明照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77页。

③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28页。

④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8页。

⑤黄广华:《〈文心雕龙〉与因明学》,《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

⑥张弘:《〈文心雕龙〉审美范畴的佛教语源》,《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论》提出：“弃迹求心”^①的观点，这和“心哉美矣”的境界是一致的。佛学经典《华严经十地品》有“三界所有，唯是一心。十二有支，皆依一心”等说法，认为人从生到死，也无非都是“心”的显现，所以都是“依以一心”。同时《法华玄义释签·序释签》也有“盖序王者，叙经立意，玄义述于文心，文心莫过迹本”的说法，刘勰的“文心”思想即本于此。同时，佛家还有一部重要经典《阿毗昙心论》，晋来释迦提婆和释慧远合译后简称《心论》，心有要解之意，《心论》的基本思想是“显法相以明本”，即是说，知道了法相，就能发生智慧。《出三藏记集》序类卷十所收关于《阿毗昙心》之序文多篇，慧远法师《杂阿毗昙心序》亦在其中，“博通经论”的刘勰必读过此文自是无疑。齐梁时期，《阿毗昙心》之学盛行，影响极大，刘勰寄居定林寺，师从僧祐学习律宗，参加《出三藏记集》等佛经的整理工作，对于这部佛经著作，亦当十分熟悉。《阿毗昙心》之心意为“最上法之要解”，《文心雕龙》之心意为“为文之要解”，可见，《文心雕龙》之心亦出自《心论》之心当不难理解。故范文澜先生在《文心雕龙注》引中说：“《文心雕龙》的书名，便是受到慧远《阿毗昙心序》的启发。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诵，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宗会，故作者以心为名。”^②此言甚是。

（2）《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渊源于佛学

“原始要终”的思维方式源于佛学：

《出三藏记集》卷第八收支道林作《大小品对比要抄序》一文，谈到其“揽始源终，研极奥旨”的原则时曰：“或失其引统，错征其事巧辞，变伪以为经体，虽文藻清逸而理统乖宗。是以先哲出经，以胡为本。”^③支道林的观点是针对晋宋以来因佛经输入而产生的“新声”（离宗去本之经文）而言的，这和当时文坛离宗去本的形式主义文风有一致之处。在南朝著名的佛教徒中，慧远也持有这种追根索源的思维方式，他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以明晰的言辞陈述了以佛教为穷极根源之道的见解。慧远的这种思

①（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07页。

②（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28页。

③（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02页。

维模式,还体现在他的其他著作如《明报应论》《阿毗昙心序》《三法度序》中。《出三藏记集》卷第四《新集续撰失译杂经录序》曰:“今悉标出本经,注之目下,抄略既分,全部自显,使沿波讨源,还得本译矣。”^①又《释迦谱序》云:“而群言参差,散出首尾,宜有贯一之区;莫齐同异,必资会通之契。故知博讯难该,而总集易览也。枯……遂乃披经案记,原始要终,敬述《释迦谱》记,列为五卷”。僧祐《出三藏记集·序》中也有“沿波讨源”^②之论,“沿波讨源”和“原始要终”的精神实质是一样的,都体现为一种追根溯源的思维方式。佛学的这种思维模式,必然会对刘勰的写作产生影响,在《文心雕龙·序志》篇里,刘勰对其文论先辈颇有微词,原因主要就在于思维方式上的歧异,如《序志》篇曰:“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刘勰不满于他之前的文论家们不能像他一样来作“振叶寻根”、“原始要终”的工作。《文心雕龙》一书对这种思维方式多有反映,《诠赋》篇曰:“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知音》篇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体性》篇曰:“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原始要终”这种思维方式要求在研究各种文学现象时,必须注重对其产生的原始精神的考察,这种思维方式贯穿《文心雕龙》全书,而其理论源头却出自佛学。

“识昧圆通”的思维方式源于佛学:

“圆通”是佛学的一种认识方法,它强调对事物的全面把握,要求认识到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如《鸠摩罗什传》曰:“其新文异旧者,义皆圆通,众心惬服,无不欣赞焉。”^③僧祐《弘明集序》曰:“夫觉海无涯,慧境圆照”^④,可见,“圆通”、“圆对”、“圆照”等是佛学的一种辩证思维方式,要求全面系统地认识事物。《征圣》篇中有一段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刘勰的这种辩证法思想:“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辩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词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

①(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3页。

②(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页。

③(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2页。

④(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80页。